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1917-1947)

時代社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 1917—1947 )

時代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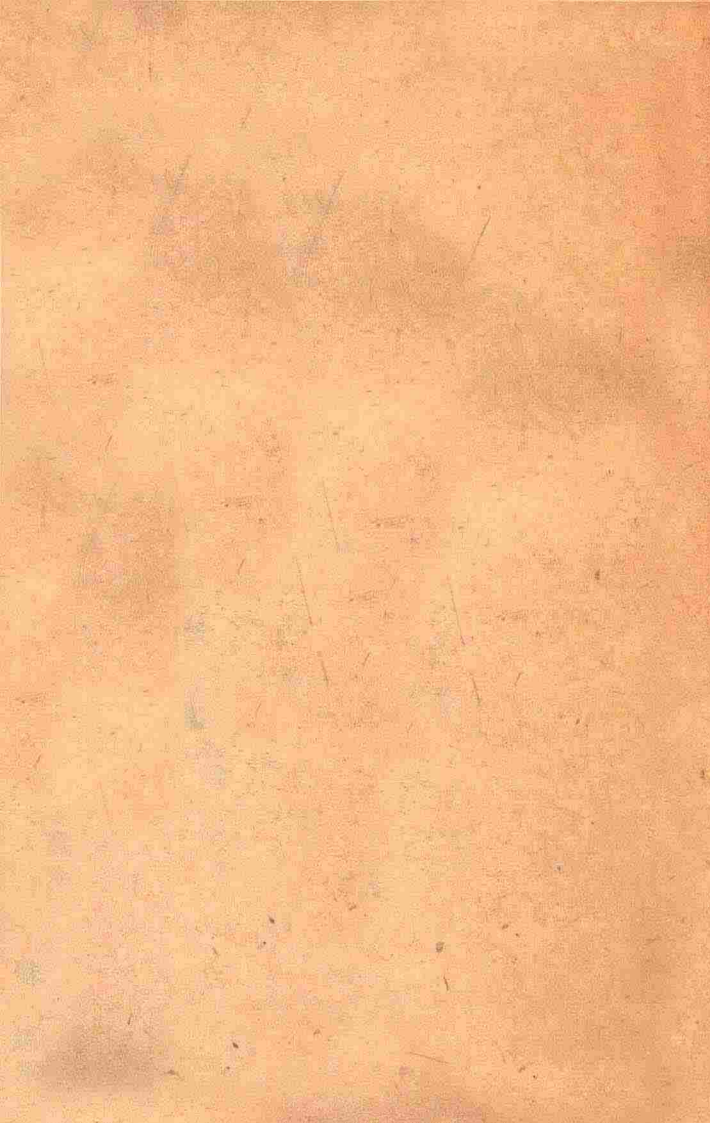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1917-1947)

時代社



## 目 次

蘇聯對外政策的民主基礎……………(5)

I. 列 明著 何 歌譯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17)

N.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一)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17)

(二)蘇聯對外政策的徹底性和真誠性…(30)

(三)爲各民族平等和獨立而鬥爭……………(39)

Н. Рубинштейн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евод Пан Гуан-цзу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2-ое издание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著作者 Н羅賓斯坦 翻譯者 潘光祖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一

ЕРОСНПУВСО



(1947, 11: 2000册)

(1949, 12: 3000册)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二六九號

電話：一四〇二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三六一八號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 蘇聯對外政策的民主基礎

1. 列 明 著

何 歌 譯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國際關係方面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在這以前，全世界都被帝國主義控制着。而什麼是對外政策方面的帝國主義呢？這就是反動勢力和民族壓迫的加強，瘋狂地併吞別人的土地和殖民地，大多數弱小國家的服從極少數強國，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發展不平衡性的尖銳化，以及為重分世界而引起的世界大戰。

自從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勝利之後，與侵略的、併吞的、反動的帝國主義對外政策對立地出現了正義的、進步的、愛好和平的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蘇聯的對外政策，從它第一步起就走向着這樣的目標：使全世界人民免除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和蹂躪，援助

國際舞台上的進步民主力量，放棄秘密外交，廢除強暴的、奴役的不平等條約。

蘇維埃對外政策的基礎就是要求和平的意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翌日，蘇維埃政府就頒佈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戰國家提出了民主而公正的和平建議。和平政策——這對於蘇維埃國家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暫時的現象。它與蘇維埃社會制度有機地關聯着，正如掠奪、侵略和戰爭的政策之與帝國主義國家分不開一樣。

蘇維埃國家代表着人民大眾的利益，而人民不要戰爭——他們要和平。蘇維埃國家關心的，是國內生產力的積極發展，人民幸福的不斷增高。如所周知，資本國主義家的工業化通常總是與侵略戰爭，掠奪鄰國，索取賠償（例如德國）或擄取殖民地（例如英國）相關聯的。蘇維埃國家發現了自己的特別的工業化道路，不需要向外擴張的道路。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可能性，蘇聯在不到二十年的短短時期中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變成了最進步的農業地區。和平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前提。

現在，蘇聯人民向自己提出了巨大的令人興奮的目標——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很明顯地，這首先需要和平。所以，戰後時期，蘇聯



繼續徹底執行自己的正義的、和平的對外政策，是很自然的。『蘇聯的和平政策並不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莫洛托夫外長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對選舉人演說道，『它是根據我國人民的基本利益和現實的需要，根據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質幸福，根據蘇維埃人在建設新生活時的巨大要求而決定的。蘇聯人民深信，蘇聯將順利解決這一切任務，如果侵略者的雙手被縛住的話。』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建基於平等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上的，它是建基於尊重一切大小國家和民族的權利與獨立原則上的。在帝國主義環境中，民族和殖民地的壓迫，大小民族的主權和權利的輕視，是國際關係的常規。蘇維埃國家一開始就放棄了沙皇所強加於東方諸落後國家——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蘇維埃對外政策的這些崇高原則，具體表現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列寧和史大林致俄國及東方的回教徒勞動者的文告中，及其他對外政策的文件中，特別是後來與中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所簽訂的條約中。

蘇聯自始至終堅持着民族自決權並且努力保護着民族權利，使它們免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破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保護弱小民族的權利的問題是

與愛好和平各國建立統一戰綫的問題以及警告日益逼近的戰火的問題密切有關的。

歷史不會忘記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領袖們在日益兇猛的法西斯侵略火焰面前的可恥、胆怯和可惡的行爲；歷史不會忘記，這些領袖們怎樣背叛和出賣了阿比西尼亞，中國，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民族的利益；他們怎樣把全世界的利益做買賣；他們怎樣點燃反蘇戰爭，他們怎樣用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協定打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閘門。

歷史也不會忘記蘇聯對外政策的崇高可敬的舉動：它會號召設立集體安全制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會英勇保衛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等遭受法西斯侵略各國的利益，它忠於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國際義務，它建立了愛好和平國家的統一戰綫。

在戰後時期的環境中，蘇聯繼續守護着愛好和平各國合作的原則，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自決原則。蘇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與種族的歧視。它擁護殖民地民族的完全獨立而不是虛有其名的獨立。

蘇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也不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強加於別人。列寧和史大林堅決反對『推銷革命』和『輸出革命』的理論。選擇適當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這是各民族本身的事。同時，蘇聯努力保

護弱小民族，使它們脫離外國反動集團的干涉。希臘的情形已足夠證明，這種干涉將引致怎樣的後果——它引致了內戰的爆發，法西斯的猖獗，造成了戰後世界中的混亂與不安的發源地。現代『新復辟主義』的概念，即支持為人民所仇視的或已被人民推翻的反動舊政權的概念——決不能作為持久和平政策的基礎。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唯一根據科學基礎，根據正確和精密理解社會發展法則的政策。

這使蘇聯的外交不但能正確分析當前的形勢，並且能預計到事變的發展過程。列寧和史大林在科學地解決國際關係問題和蘇聯對外政策問題方面，作了非凡的榜樣。我們可以引述許多歷史節例，來證明列寧—史大林的科學預見的力量：如列寧評論凡爾賽組織為腐敗的、不穩固的和軟弱的組織；史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預言資本主義的穩定必然崩潰和危機必然到來，以及資產階級將在戰爭中尋找出路等。還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最初打擊時，史大林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聯共（布）第十六次黨大會報告中就預言，反動集團將在國內法西斯化，在國外戰爭和侵略方法中尋找出路以逃避危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聯共（布）第十七次黨大會中史大林說得更確定：『局勢正日益走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在同一報告中，史大林具體暴露了那自

的高等種族的德帝國主義的各種戰爭計劃時，提醒了古羅馬的命運，後者會把其他民族看做野蠻人，而結果被反對她的各民族聯合起來所打倒了：『那末，我們要問，今天的高等民族的要求，怎能保證不會引致同樣的悲慘結果呢？』——蘇維埃國家的領導者當時說道。讓那些現在也自稱為『高等種族』的世界霸權的觀戰者，回想一下這已經應驗的預言吧！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公開的，誠實的，有原則的和澈底的政策……它反映着蘇聯人民和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利益。公佈沙皇政權所簽訂的祕密的帝國主義條約，是蘇維埃外交的最初行動之一。蘇維埃國家沒有什麼要隱瞞世界輿論，因為她追求着正當的崇高的目標。蘇聯的外交是言行一致的。對國際義務的尊重，對諾言的忠實——這就是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特徵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戰時，愛好自由的各民族都已相信蘇聯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而這股力量是保障愛好自由各民族的權利，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是反法西斯聯盟的決定性的戰鬥力量。蘇聯一對一地與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苦鬥了三年，德國武裝力量和作戰力的五分之四都用來對付蘇聯。甚至在歐洲戰場開闢以後，德國武裝力量和作戰力的三分之二還是集中在東綫，以對付

蘇聯。爲了反法西斯聯盟的利益和加速勝利的到來，蘇聯竭力爭取開闢第二戰綫，使英蘇美聯盟的全部資源都動員起來。然而，如所周知，英美統治集團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却是不同的。第二戰綫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季，即當希特勒德國的命運已經決定，當紅軍已能夠獨力佔領整個德國和解放法國的時候，方才開闢。

蘇聯是反法西斯聯盟的政治領導力量。蘇聯的參戰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性和解放性。與蘇德戰綫上所展開的大規模戰鬥比起來，以前的事件祇是些小小的插曲。在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眼前，蘇聯的鬥爭是戰爭的反法西斯解放性的具體表現，是它的正義目的的保證。

蘇聯是爲完全的、澈底的戰勝敵人而鬥爭的，因此她給了一切反動的、慕尼黑的、半法西斯的集團以打擊，後者曾企圖與法西斯侵略者勾結，爲他們爭取妥協的和平。蘇聯堅決擁護法西斯侵略首腦的無條件投降的口號

蘇聯光榮地，作爲歐洲和世界文明的拯救者，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際反動黑暗勢力企圖歪曲和污衊蘇維埃對外政策的真實的崇高的目標。反蘇毀謗者製造了所謂『鐘幕』，所謂『莫斯科斯芬克斯』和所謂蘇聯的『不光

明的」，「祕密的」意圖等神話。他們根據「毀謗，毀謗，想盡方法毀謗！」的原則而行動。但是這種毀謗已經有長久的歷史了。我們在二十年代，在三十年代以及在戰爭時期也聽到過關於蘇維埃政策的「祕密性」的囂聲。事實證明，蘇聯祇爭取了一件東西：和平與安全。而現在她還在爭取持久的和平與安全。

蘇聯是以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可以並存和必需合作的事實為出發的。與建立思想觀念集團的政策相反，蘇聯提出了國際合作的政策。蘇聯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別並不是國際間經濟，政治和文化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礙。史大林在最近一個時期中，曾數次提到這個現代國際政策的決定性問題。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與史達森談話時，史大林指出，蘇聯的經驗證實了合作的可能性，而這種合作也可以在和平時期繼續下去。史大林指出，這種合作應該建基於尊重人民所選擇的制度，歷史將顯示出，那一種制度更好。

資產階級的政論家企圖把史大林的話解釋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先前原則的修正。但是史大林與史達森談話時，並非偶然地引證列寧的話，後者最先提出了兩種制度合作的思想。在一九一九年九月致美國工人的信中，列寧曾說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將並肩

生存的』時期，並且認為兩種制度的最廣泛的經濟合作是有希望的。在一九二七年聯共（布）第十五次黨大會上，史大林指出道，『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的基礎，就在於兩種對立制度可以並存。』

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合作原則，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鬥爭時期，順利地實現了。這種合作並不局限於軍事方面。如所周知，蘇聯即在和平時期也可以成爲一個有希望的，優良的主顧，特別是因爲蘇維埃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情勢是無關的。所以，和平時期的發展國際合作是具有一切可能性的。思想意識的不同並不妨礙這種合作。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回答威斯的問題時，史大林指出，隨着蘇聯的日益走向共產主義，『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但不會減少，而且可能增加。』

現實而合理的國際合作綱領，獲得了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進步民主集團的支持，以及願意發展對蘇商業關係的清醒的資本主義集團的支持。

在聯合國機構中，蘇聯努力保護着平等合作的公正原則。最近，却有人企圖動搖，甚至破壞新國際安全機構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特別是大國一致的原則，即所謂『否決權』，遭受了某些帝國主義集團的殘酷攻擊。然而，這個原則却是大國必需一致和協議的具

體表現，它可以確保國際安全機構的效力，促進不同的社會制度在這機構中的合作，並且可以豫防它變成某一強國的工具。

蘇聯領導進行消滅和禁止原子武器的鬥爭，領導進行嚴格裁軍，停止那毫無理由的佔領別國基地與土地的鬥爭，以對抗帝國主義的擴軍和以戰爭作威脅的『原子外交』。

以自己的心思來忖量別人的新戰爭宣傳家們，企圖把蘇聯的這種公正政策曲解為投機思想或蘇聯的狹義民族主義動機。這是多麼陳舊的，令人厭惡的解釋！它們早在國聯的時代就出現過了，當時蘇聯提出的裁軍計劃，遭到了普遍的反對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怠工。蘇聯的禁止原子彈和裁減軍備的建議是符合全世界千百萬人的希望的。它們獲得國際的熱烈響應，絕不是偶然的。

蘇聯在戰後時期徹底堅持着建立持久的、民主的和平事業，祇有這種和平才能保證防止新侵略的抬頭。蘇維埃外交在與前德國附庸們締結和約時，堅持了這些原則。如所周知，某些強國會企圖利用和平條約作為政治和經濟壓迫東歐各國的武器，以便鼓勵新民主國家中的反動勢力，替舊政權的復甦掃清道路。這個攻勢被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的共同力量所擊退了。



蘇聯在解決德國問題時，堅持德國民主化，實現賠償計劃，擴大德國工業的和平生產的可能性，協助國內的真正民主力量，消滅獨佔組織以及實行土地改革等原則。蘇聯認為，德國統一的問題必須由德國人民自己來決定，因為強迫的聯邦化或分解德國，將把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武器——德國統一鬥爭的領導權——交給德國報復主義者的手中。

蘇聯主張，對日和約的締結，以及一切與日本有關問題的解決，也在各有關盟國的平等合作的基礎上進行，以有利於民主和平與安全為原則。

國際反動派感覺到自己腳下的基礎在動搖，他們激怒了。新戰爭的煽動家展開了瘋狂的活動。因此，一切和平的友人必需提高警覺性。因此，我們必需一分鐘也不疏忽帝國主義的詭計。和平的友人們現在是擁有許多有利條件的。

一切國家裏的『普通人』都不要戰爭，而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也不得不或多或少地顧忌到他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廿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關於廢除死刑的命令中說道：『雖然侵略份子還企圖煽起戰爭，但和平的事業可以認為已經有了一個長時期的保證。』

蘇聯——這個國際舞台上最強大的進步力量——的對外政策就是這樣的。蘇聯在國際關係方面堅守着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宣示的原則，暴露了帝國主義的戰爭煽動者的狡猾陰謀，保衛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一切愛好自由民族的合作的事業。

#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N. 魯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 一

###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是人類歷史的轉捩點。在這一天，由於共產黨及其領袖列寧與史大林領導下的武裝的工人和農民的意志，在俄羅斯產生了一種國家制度——蘇維埃國家。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誕生的蘇維埃國家展開了國際關係上的新時代。

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以前，列強對外政策的本質和基礎，雖有目的和方法上的不同，但仍是一致的。德國、英國、法國、美國都爲了確定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特殊任務而鬥爭。每一個國家都提出自己的對

外政策學說——在第一種場合他們可以命名為『歐洲均勢』政策，在另一種場合則是『泛日耳曼主義』，第三種則是『門羅主義』。領導對外政策的是各種不同的人物——英國是勞合·喬治和華爾夫，美國是威爾遜和藍辛。然而，無論是在倫敦或東京，華盛頓或柏林，彼得堡或巴黎，到處一樣，政府的對外政策都脫離不了帝國主義的政策。表面上用了故意含糊的詞令和傳統的禮儀，用備忘錄、用國會裏關於對外政策的辯論等等來辦理外交，但是，所有這一切狡猾的詞句，一切祕密談判的幕帷都是爲了大企業家和辛迪卡的利益。這是分割世界的鬥爭，這是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它在各地都是這個或那個國家內剝削階級的對內政策的繼續。

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根本不同，因爲社會主義國家是建基於另外一種社會關係制度上面的。蘇聯對外政策的內容，她的目的和任務，她的本質，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相比是完全兩樣的。

衆所週知：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之間，在她們對內和對外政策之間，並沒有根本的原則上的差別：不久以前，當美國共和黨政治家哈洛德·史達森訪問史大林的時候，他曾企圖證明美國和德國的經濟

制度好像是彼此各不相同的，史大林同志就對史達森解釋他的錯誤。史大林說：『……美德兩國的政體是有差別的，但是經濟制度沒有差別。』<sup>①</sup>

蘇聯的經濟制度，正和她的社會制度一樣，和資本主義國家有着根本上的差別。蘇維埃對外政策從不知道那些代表大獨佔資本家意志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私利益，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在蘇維埃國家裏沒有資本家階級。

『您要做對我們有利的事，』蕭伯納劇本中的一個人物，大軍火資本家安德爾瑪特對自己的兒子——未來的英國的議員這樣說。

『您得宣戰，如果這對我們有利的話；您也可以維持和平，如果和平對我們適宜的話。』

蘇聯沒有像安德爾瑪特那樣的人物，沒有華爾街『六十家族』那樣巨億和百萬富豪——他們是決定美國命運的人物；也沒有倫敦商界的巨頭，沒有在法國保持其控制地位的『二百家族』。蘇聯的政策，是以二萬萬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的，這是和各國勞動者的基本利益一致的。

雖然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具有根本的差別，然而，蘇聯過去和現在始

① 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真理報』。

終擁護與這些國家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曾經在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決死鬥爭時期順利實現，它在和平時期也會實行，並且還在實行着。儘管戰爭煽動者們（戰爭販子們）怎樣誹謗，蘇聯曾經而且仍在堅持公正的國際合作。

史大林在和史達森會談時說過：「爲了合作，不必要求各民族有相同的制度。應該尊重人民所選擇的制度。祇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合作才有可能。」

蘇聯的對外政策，依據着列寧和史大林所確定的不可動搖的原則——蘇維埃國家的獨立和光榮，大小民族的利益和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蘇聯在國際會議的圓桌席上堅決和澈底地維護本國利益和大小民族平權的原則，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民族權利。

蘇聯在國際會議中對弱小民族、殖民地和附屬地的英勇保衛和援助，是出乎衷誠和毫無私心的。這就引起了東歐、近東和遠東許多民族對蘇維埃國家的同情和感謝。蘇聯各民族的利益，是符合外國勞動者的基本利益的，所以蘇聯的對外政策在全世界各民族中間引起了這樣肯定的反響。這也是蘇聯政府的政策和資本主義各國政策的顯著差別之一。

蘇聯的政策，首先是和平的政策。大家都知道，戰爭的災難的重担，首先是加在勞動者身上的。至於

侵略戰爭的真正罪犯，資產階級，他們所受到的戰爭痛苦，遠較別人為少。軍隊是由勞動者補充的，而在後方遭受犧牲和痛苦的也是工人、農民和職員。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得不到任何利益，也得不到什麼殖民地，却用自己的鮮血貢獻給統治階級。

這就是為什麼勞動階級是唯一真誠的和平擁護者。

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寧手寫的和平文告中，蘇維埃政府就聲明了自己力求公正的民主和平的意圖。但它並不限於口號的宣佈。不是所有交戰國的部長們也口口聲聲喊着公平和民主嗎？

『我們要為反對各國政府的欺詐而鬥爭，它們在嘴上高唱和平、公正，而實際上却在進行侵略和掠奪的戰爭。』——列寧這樣解釋。②

布爾雪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不屈不撓地實現列寧所說的話，已經三十年了。黨和政府在外政策方面的一切事件中，始終遵照着列寧和史大林在歷次黨大會上關於國際情勢和蘇聯對外政策的報告，它們在蘇維埃大會上暴露了世界政治舞台上所進行的一切事件的真相。

列寧的文告所以在對外政策中標明了一個新時代

---

② 『列寧文集』，第二十二卷，第十六頁。

，因為他的文告不僅僅是對政府而發的。

幾百年來，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一向只由統治集團決定，人民不能參加，人民也不得而知，因為他們的決定是反對人民的。蘇維埃國家絕不忽視擁有實際政權的人民，她在歷史第一次求助於人民。

『政府和人民到處是分離的，因此，我們應該助幫人民參與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列寧這樣說過。②

列寧的和平文告，清楚顯示了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本質。

蘇維埃政府在這個文告中聲明廢除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的祕密條約，並願意完全公開進行和平談判。因此，列寧的法令是宣布了切切實實的人民對外政策。

『……和平的鬥爭開始了。這一鬥爭將是艱苦和頑強的，』列寧在十月革命的第一天就這樣說。而過去的三十年，完全證實了這句話。

蘇維埃政府在三十年的期間從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和任何一點可能以便為和平而鬥爭。它在布列斯特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就會為和平而鬥爭，同意和蒲立德簽訂條約，並參加親王島的會議。為着同一目的，

---

② 『列寧文集』第二十二卷第十五頁。



它又參加了熱那亞的海牙會議。蘇聯和平政策的澈底和她的意志與目的之真誠，可以作為最明顯的證據的，就是蘇聯為實現普遍裁軍而進行的鬥爭。蘇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在熱那亞公布的宣言，一九二七年在縮軍準備委員會上提出的關於普遍裁軍的方案，以及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建議案——所有這一切都是始終一貫的。當看到國際聯盟至少可以利用作為反法西斯侵略的「小丘」時，蘇聯參加了國際聯盟，雖然國聯的反蘇意圖在當時已被十四年的經驗所證實了。不侵犯協定，關於侵略定義的協定，為集體安全制的鬥爭，互相協定——蘇聯都一一加以利用，為和平而鬥爭，並且在這鬥爭中的每一時刻都尋覓到最適當和最可靠的方法。

一九一八年夏天，當「左翼」社會革命黨和托洛斯基份子對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米爾巴哈實行挑撥的暗殺之後，凱撒政府會無恥地向蘇維埃政府要求允許德國武裝軍隊在「保護德國使節」的名義之下，進入莫斯科。當時俄羅斯在軍事方面要比威廉二世的德國衰弱得多，但是蘇維埃政府在給德國人的答覆中充滿着鋼鐵樣的堅定。

「……在守護工人和農民的和平意志時，」列寧

說：「蘇維埃政府從不忽視有一個界限，超過了界限，那裏，就是最愛和平的勞動大眾，也將被逼起來，而且像一團人那樣地站立起來，用武裝的手保衛自己的國家……」

「對於這個步驟，我們將像回答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和英國人在北方的軍事行動一樣，不得不這樣回答，即：加強動員，號召每一個成年的工人和農民，進行武裝抵抗。」<sup>④</sup>

德帝國主義者在蘇維埃政府這種剛毅和堅忍的態度面前，不得不退讓了。在後來的幾年中，蘇維埃政府也不得不常常「教訓」資本主義國家，怎樣和蘇維埃國家共處。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裏，史大林在警告協約國的政府時寫道：「……在很快的時期內，「同盟國」將確信：俄羅斯「並不是中部非洲」。」<sup>⑤</sup>

關於這一點，應該回憶到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前夕。列寧當時曾經警告企圖「壓倒」蘇俄和逼使她投降的英法兩國的政治家說：「威脅，我們早已看得夠了……我們看到過同盟國方面的大砲威脅，在他們手裏幾乎把握着全世界。然而我們並沒有被這種威脅嚇倒。關於這一點，歐洲外交界的先生們，請別

---

④ 『蘇聯對外政策』，第一卷，第一百十三頁。

⑤ 『史大林選集』，第四卷。

忘懷了」<sup>⑤</sup>

在熱那亞會議席上也是這樣，蘇聯代表在答覆「同盟國」的最後通牒的要求時，也曾平心靜氣和明白曉暢地說明：蘇維埃政府為與別國獲得協調而參加會議，它注意到，「……組織過武裝干涉的外國，以戰勝者對被征服者的態度拒絕與俄羅斯談判，然而，俄羅斯並不是戰敗國。對於俄羅斯人民，絕對不能接受這樣的協定，如果他們在協定中的讓步，得不到實際利益的補償的話。」<sup>⑥</sup>

一年以後，英國政府對蘇聯發出所謂寇松的最後通牒。雖然直接以戰爭作威脅，然而蘇聯政府並沒有被嚇倒。蘇聯政府拒絕最後通牒的答覆，是完全值得讚美的。蘇聯給寇松的答覆中說：「用最後通牒和恫嚇的方法，並不是調解國際間個別的和次要的誤解的方法，無論在何種場合，如果要用這種方法來和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正常的關係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是國家的生命力及其政府政策的最重要的考驗。史大林說：「戰爭……無情地揭露了那一切掩沒國家、政府和政黨的真實面貌

⑤ 『列寧文集』，第二十七卷，第一百七十一頁。

⑥ 『熱那亞會議資料』，莫斯科，一九三二年版，第二百四十頁。

的幕帷，使國家、政府和政黨不加任何面具、不加潤飾，讓它們帶着自己的一切缺點與優點走到舞台上來。」<sup>①</sup>

判斷一個政黨和它的政策，判斷一個政府，不能根據它的綱領、宣言、聲明，而要根據它的事實，它的活動的結果。關於這一層，史大林曾經不祇一次地提醒過。判斷對外政策，也應該根據它的結果。

過去許多年來，包括戰後的兩年，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的結果怎樣呢？

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壓迫民族自由與獨立上面的世界霸權的覬覦者的希特勒德國和日本，終於被打倒和粉碎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德國的附庸，也都遭到了這樣的命運。

法國（它的統治者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而且有如當時莫洛托夫所指出的，他們害怕自己本國的人民，而且過低估計了蘇聯的意義），終於導致國家的覆滅，結果她暫時被拋出了強國的行列。

以前由邱吉爾政府推行而現在由工黨政府執行的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導致大不列顛趨於衰弱。英國變成美帝國主義的小夥計，喪失了不少原屬於她自己的自主性。

---

①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史大林在選舉人大會席上的演詞。

美國利用了在戰爭中贏得的勝利而發屢了自己的擴張。然而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看到美國這種政策威脅了自己的獨立主權和自由發展，看出美國反動派是世界霸權的覬覦者。怎樣在「願意走向新戰爭的廣大世界人民眼中，喪失了威信。

蘇維埃國家在三十年來的對外政策方面獲得的是完全不同的結果。蘇聯在希特勒德國的崩潰和促進日本帝國主義的迅速投降中，表現了決定性的作用，以自己的獨立鬥爭從瀕亡中挽救出現代文明。差不多全部過去被帝國主義無理分割的蘇聯領土，從新回到蘇維埃國家裏來了。

蘇聯在西方、西北和遠東的疆界，比以前更強固地保障着國家的安全。以前從巴倫茨海到黑海的經常威脅蘇聯的反蘇「防疫地帶」，現在已不再存在了。現在蘇聯是和民主國家接界，蘇聯和她們都已奠定永久的友好的基礎。

蘇聯把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從希特勒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幫助芬蘭和匈牙利恢復他們的民族獨立而永遠爭取到了她們的同情。

蘇聯的對外政策依靠着一萬萬蘇維埃人民的無限和永遠的擁護。這種擁護的最重要前提，就是蘇維埃

政府以列寧關於國家力量的原則出發的。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說：『資產階級只有當它能用全部政府機關的力量來把廣大羣衆驅向資產階級希望的地方去的時候，才承認國家是強大的。我們對於力量的了解是不同的。按照我們的意見，國家是因羣衆的自覺而強大的。只有當廣大羣衆都知道，都能判斷並根據他們的自覺而進行的時候，國家才會強大。』②

蘇維埃國家政策的力量，正因為它是二萬萬蘇聯人民的政策。

史大林在第十八屆黨大會上決定蘇聯的對外政策時說：『蘇聯在自己的對外政策中依據的是：

『一、自己的日益增長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

『二、我們蘇維埃社會的精神和政治的團結；

『三、我國各民族的友誼；

『四、自己的紅軍和紅海軍；

『五、自己的和平政策；

『六、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勞動者的精神上的支持；

『七、那些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國家的考慮。』③

---

② 『列寧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十八——十九頁。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還是把這些原則作為自己的對外政策基礎。恰像戰時蘇聯成為反法西斯主義解放戰爭的先鋒一樣，目前她是民主國家為爭取持久與民主的和平，也為鞏固與愛好和平民族合作及揭發戰爭煽動者的鬥爭中的先鋒。

蘇聯在其戰後全部對外政策中，力求「建立各民族間長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在互相信任和互相援助的基礎上，以期復興為德國人所破壞的經濟和文化。」（史大林）

---

⊕ 史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七版，第五七四頁。

## 二

### 蘇聯對外政策的澈底性和真誠性

列寧—史大林的對外政策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澈底性，誠實性和原則性。

早在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時候，美國著名的實業家和新聞記者富蘭克·溫德利普就曾為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這種特性而大發牢騷。

他譏諷地說：

「在達到和俄羅斯人令人滿意的相互了解的途徑上，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它們的誠實性。他們切實完全信任他們在各種宣言中所說的態度的正實性。而其他強國的代表，在某種意義上，就較少這種誠實性。」<sup>⊕⊖</sup>

西方進步的歷史家們寫道：「蘇維埃外交的特徵就是直言無諱的作風。」<sup>⊕⊖</sup>蘇聯三十年來從來沒有

---

<sup>⊕⊖</sup> 《The World》，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次離開過原則的路綫，也從來沒有一次規避自己應負的責任，他往往陷於孤立，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她們自己在國際條約和協定上所簽的字抱着像德國首相畢脫門·霍爾威格這樣的態度，他把比利時的中立只看做「一紙具文」。但是蘇聯却負他的責任，把自己所寫的字看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最近三十年歷史的每一頁都證明這一點。當列強「忘却」了自己的責任而打開了法西斯侵略的大門之時，蘇聯却仍舊忠於他的義務。例如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的時候，蘇聯曾在國際聯盟裏維護阿比西尼亞，並且在對意關係上澈底實施制裁，雖然參加國際聯盟的其他國家都對這種制裁實行怠工。

當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偕同他們的代理人佛朗哥絞殺和蹂躪西班牙人民的那些年代，也是這樣。當時蘇聯是孤獨的——因為張伯倫和勃魯姆的政府為意大利——德國對西班牙的干涉開路。但是蘇聯却照舊忠實於國際法的原則，忠實於援助人民的原則，忠實於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的原則。認識了史大林言論的歷史性的正確：『從法西斯反動派的桎梏下解放西班牙，這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所有全體進步人類的

---

⊕⊕ W. Roo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 (『戰爭秘史』)

共同事業。」

當達拉第和張伯倫違反了英法兩國都會在上面簽字的條約和協定而把捷克奉送給希特勒的時候，只有蘇聯提高他的呼聲去維護她，根據一九三五年的互助條約履行自己的義務。

當現在美國反動派和他們的英國夥計妄想偷偷地撕毀在雅爾達和柏林簽訂的協定的時候，蘇聯揭發出破壞國際協定的罪惡，忠實於在克里米亞及柏林會議上所簽訂的原則和聯合國機構的憲章。

這種澈底性，是列寧—史大林對外政策的不可侵犯的性質。它不會不如此，因為蘇聯政府在自己國內用不到運用權術和兜圈子，國內沒有敵對的階級，有的是蘇維埃人民的道德政治的統一。

蘇聯對外政策的路線，和她的對內政策一樣，永遠是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經驗。

這是國外進步人士所明白的。

『在社論作者的字典裏，』威佛爾利·魯特在他所著的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裏寫道：『有一個形容詞是不免要用在像「蘇聯對外政策」，「史大林政策」，「俄羅斯政策」那樣的措詞之前的。這個字就是「謎樣的」。好像斷定蘇聯的政策是曖昧的，不易理解的，當你和她的發生關係的時候，那就只有等待意

想不到的事情，好像她在最近幾年來沒有按照任何一定的，有計劃的路綫。」

『對照法就是真理，』魯特說。『經過了近數年來震撼世界的一切大事，俄羅斯不屈不撓地對準自己的目標走自己的道路。如果她的行程在局外人看起來是容易變化的，那只是因為他們從容易變化的立場上去估量她……所以毫不奇怪，因為沒有變化，「變化政策」的基礎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實際上並沒有變化。』⊕⊖

工黨左翼黨員齊里亞古斯當時也會指出，英國政府對外政策「最可驚異的優點」，就是他們沒有任何的對外政策。他們用那種使另一更壞的危機成爲不可避免的方法來一天一天地拖延一個危機，恰像網中之魚一樣，在盲目力量的壓搾機中殘酷地搏鬥，把他們——和我們——拖向可怕的滅亡。他們按照着與統治階級的傳統、偏見和自私相適應的本能去行動，但是由於巨大的戰爭與巨大的危機而猛烈地改變了世界，陳腐的方法再也不能發生作用了。他們竟不明白世界上發生了的事情。他們就那樣沒有計劃地行動，由失敗而至恥辱，由恥辱而至不幸，更由不幸至破滅的結局。」⊕⊗

---

⊕⊖ W. Root, 上書第四九二頁。

齊理亞古斯對英國保守黨政府做了這樣的分析，但是它在同樣的程度上也適用於工黨內閣，甚至可以用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

至於說到蘇聯對外政策，它是以馬克思——列寧的科學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的宗師列寧和史大林，研究出了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的規律性，兩個社會制度共存的特性，並且科學地創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任務和方法。史大林——像從前的列寧一樣——在布爾喬亞政治家的詭計的背後，在國際舞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背後，看出了隱藏着的政治動力，帝國主義集團的經濟利益和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根本矛盾。

社會發展法則的知識，給予了蘇聯對外政策以巨大的力量。過去的三十年，就是證明了列寧此話：『我們計算得比任何時候和比其他強國更為正確。』

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害怕說出自己政策的目的和企圖的真相。因此他們力圖儘可能不使人民大眾知道自已的政策，當不得不說明它的時候，就遮掩它，將它塗上些顏色。正如一份早期的蘇聯文獻中所說：資本主義外交『害怕日光是有着充分的原因的。』

⊕⊕ 齊理亞古斯，『我們為什麼失掉和平』（Why We Are Losing the Peace），一九三九年，十七頁。

蘇聯對外政策提出了崇高的任務。列寧曾經說過：『政策上的誠實，是力量的結果。而虛偽則是脆弱的結果。』很容易明白，蘇聯正和帝國主義者相反，她所希望的是國際關係為最明亮的光所照亮。蘇聯在國際會議上之維護公開性，並不是徒然的。莫洛托夫對巴黎和會的參加者所發出的不要疑懼輿論的呼籲，蘇聯政府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的建議，以及提供聯合國國家留駐在別國領土的武力的情報的建議，都是值得記憶的。

蘇聯對外政策的偉大的歷史性功績，在於它經常而且堅決地揭發帝國主義外交的詭詐、虛偽和欺騙，這種虛偽不能只認為是帝國主義國家政治家的主觀的素質。布爾喬亞國家的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愈深，布爾喬亞的政治的及其他的辭令也就愈加虛偽。這種早在一百年前就為馬克思所指出的原理，在近數十年來格外明顯地被證實了。這一切要求蘇聯支出很大的力量，在各國人民大眾面前揭露出帝國主義政策的真實本質，而它的作者和實行者，却想把它的本質隱藏在和平及人民幸福的虔誠的辭令、驚人的修辭、偽善的嘆息、假意的激動以及溫和的空談的後面。

當年列寧和史大林曾經揭穿過威爾遜掩飾美帝國主義掠奪計劃的偽善的辭令。後來史大林又指出了羅

迦諾政策、道威斯計劃的作者的四平八穩的空論後面所掩藏着掠奪性的思想。全世界各國人民永遠在自己心裏保存着對史大林的感謝，因為他扯掉了慕尼黑份子的假面具，指出綏靖法西斯強盜的政策——即所謂「不干涉政策」，不過是默許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政策而已。毫無疑問，如果不這樣揭穿，那麼，愛好自由的人民在反對法西斯侵略者和在戰爭年份的聯合，將會遭到無數的障礙。

當那些幫助法西斯蒂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們，現在重新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和企圖按照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利益而解決根本的世界政治的根本問題的時候，應不應該說：史大林關於慕尼黑份子的批判，依舊具有巨大的意義呢？

蘇聯在戰後幾年中，也曾敏銳地注視着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並且把它向全世界暴露。我們只要回想一下史大林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關於國際政治問題的歷次聲明在國際上所引起的反響，戰爭的煽動者——美國反動派、邱吉爾及其他人等——的真正的野心，已在這裏被揭穿了。

對外政策在蘇聯出版物中以及在共產黨的全部羣衆工作中，都估着很大的地位。

蘇聯政府每當最嚴重和緊張的時候，也經常直接向人民大眾發言。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三十年間，布爾雪維克黨這樣卓越地在政治方面教育人民，每一個平常的蘇維埃人民也都熟知國際政治。外國觀察家認為蘇維埃人的政治水準和他們對於世界政治的理解，都是高出在資本主義國家人民之上，那決不是徒然的。

列寧和史大林，黨和蘇維埃政府，永遠將實情告訴人民，不問他們對此表示歡樂與否。

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和史大林的對外政策在三十年中永遠不變地在蘇維埃人的心裏得到最熱烈地支持和反響的緣故。

無論國家的情況如何艱苦，無論外來的危險的威脅如何嚴重，蘇聯人民大眾，却能萬眾一心地表示完全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對外政策。

就在外國干涉的年份，在一九二二年，也是這樣的，當時帝國主義奴役蘇俄的計劃，激起了羣衆大會的浪潮，爲了表現人民的意志而想特別舉行的國民投票——無論如何都不受帝國主義者的奴役，擁護政府的政策，堅持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的獨立。

一九二三年春天的情形也是這樣，當時人民用暴風雨般的抗議和憤怒的示威，用募捐建立『哀的美敦

』空軍大隊來回答寇松的『哀的美敦』書。

大家都會記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史大林對人民發出關於打擊背信進攻蘇聯的法西斯強盜的歷史性的號召是說些什麼。

史大林關於國際情勢和蘇聯對外政策問題的一切演說，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巴黎和會和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和聲明，也都在蘇聯人民中獲得那樣熱烈的反響。

在蘇聯代表在國際會議的圓桌上發表的每一次演說的後面，在蘇聯簽字的每一件外交文件的後面，全世界都可以聽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兩億公民堅決一致的聲音。



### 三

## 爲各民族平等和獨立而鬥爭

在戰後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基礎，又像戰前一樣，是爲奠定持久的民主和平而鬥爭。

蘇聯政府的這個綱領，在史大林論國際關係的最重要問題的歷史性演說中，和莫洛托夫在聯合國機構大會及國際會議席上的演說中獲得了發展。

蘇聯政府把切實實現民族平等原則的任務提到第一位，作爲世界和平與安全鬥爭的中心任務，這是很自然的。事實上，資本主義列強使弱小國家：捷克、西班牙、阿比西尼亞等等陷於不平等地位，這難道沒有便利法西斯侵略嗎？希特勒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豈不是把自己的侵略政策，奠基在所謂弱小國家應該從屬於他們的論調上面的嗎？而剝奪弱小國家的民族自主權，不正是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旗號嗎？

一切國家（包括小國在內）的平等權利，足以打垮任何侵略者、任何世界霸權的覬覦者的基礎。這就是爲什麼蘇聯要堅決和英勇地爲各民族與國家的獨立而奮鬥。

蘇聯認爲，這個要求是聯合國機構的有效活動的主要前提。

「這個國際機構的力量，就在於它是建基於各國平等的原則上，而不是在某些國家支配其他國家的原則上，」史大林說，「如果聯合國機構今後能夠維持平等原則的話，那麼它在確保普遍的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中無疑地起着巨大的肯定的作用。」①②

蘇聯在戰後兩年半期間，根據這個原則，奮起保護許多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自主權：在歐洲保護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阿爾巴尼亞；在亞洲保護敘利亞、黎巴嫩、伊朗、巴勒斯坦、外約旦、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朝鮮；在非洲保護埃及、阿比西尼亞、西南非洲。

因此，爲各國平等權利而鬥爭，對於蘇聯，並不

---

①②聯合社記者艾迪·基爾摩爾先生向史大林提出的問題及

史大林之答覆，『黨的建設』，一九四六年，第六——

六期，第六頁。

是抽象的形式。蘇聯這樣澈底和不斷地揭露帝國主義對世界霸權的覬覦，並不是偶然的。無論這些野心家的計劃用什麼形式出現，無論他們用什麼名義，史大林的聲明和莫洛托夫的演說，隨時隨地都暴露出帝國主義反動派反對民主與和平的真正意圖和計劃。

大家都記得，史大林怎樣揭穿邱吉爾是抄襲希特勒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論的新魁首。『從事實的本質來看，邱吉爾及其在英美的夥伴們，是向不講英語的民族提出了類似哀的美頓書的警告：承認我們的統治權則罷，否則，戰爭就不可避免。』

『但是，』史大林繼續說道，『許多國家在五年殘酷戰爭中流血，是爲了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而不是讓邱吉爾的統治來代替希特勒的統治。』<sup>①②</sup>

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中指出：美國和英國提出的所謂『機會均等』的原則，實際上就是美英帝國主義者在經濟上奴役小國的企圖，使後者受美英商行和公司控制的企圖。

『在國際生活中存在着兩種直接矛盾的方法，』莫洛托夫說，『一種方法，是很久就爲大家所知道的，即暴力和統治的方法，對於它，一切壓迫手段都是

---

①②史大林接見『真理報』記者時對邱吉爾演說之評論，一

九四六年三月『黨的建設』第五——六期第二頁。

好的。另一種方法（雖然還沒有廣泛發展），是承認一切大小國家平等原則和合法權利的民主合作的方法。」①②

無論金元外交怎樣掩飾，無論美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他們的幫手們怎樣偽善，蘇聯始終警覺地和尖利地注視着世界霸權覬覦者的陰謀，維護着小國的利益，剛剛不久以前，蘇維埃外交揭露了『馬歇爾計劃』的真正的本質，指出這是打算把歐洲各國變成被控制的國家，剝奪他們先前的經濟獨立和民族自主，而滿足美國的利益。

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巴黎蘇英法三國外長會議的聲明中，說明馬歇爾計劃及與之相適應的貝文皮杜爾方案，將引致干涉歐洲國家，特別是那些最需援助的國家的內政，歐洲分裂為兩個國家集團，將爲了美帝國主義的利益而利用某些國家去反對另一些國家。蘇聯揭穿『馬歇爾計劃』的真正本質是『西方集團』的分裂計劃，是道威斯計劃的新版。

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引起了反蘇宣傳的狂熱。帝國主義反動陣營中的無恥文人，用一切不赦的罪名加諸蘇聯。然而經過不多時候，事實本身證明了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評價的正確，而馬歇爾計劃的擁

---

①②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上的演詞。

護者貝文和皮杜爾又面臨着一個損害英法及其他歐洲小國利益的歐洲道威斯計劃。

蘇聯在自己的全部生存期間進行了爲國際和平的澈底鬥爭。根據自己爲持久和平而鬥爭以及不用言語而用事實來反對新戰爭威脅的意圖，蘇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關於普遍裁減軍備的歷史性的建議。這個建議包含了關於解除武裝這個實際目的明白而清楚的方法。

莫洛托夫在全體大會的演說中指出：裁減軍備，是對最近一次戰爭中沒有獲得侵略者的崩潰的教訓的那些集團的一個打擊。而另一方面，莫洛托夫說，不能忘記，如果與愛好和平政策的宣言同時，某些國家不僅不裁減自己的軍備，而且相反地無論在質和數字上增加着軍備，那麼，人民懷疑這種愛好和平的聲明的誠意是正確的。

莫洛托夫指出，禁止原子武器，也有特別的重要性和首要性，因爲這決不是防禦的武器，而是充作破壞和侵略別國領土之用的。

蘇聯代表團的提案，遭遇到了英美反動派的憎恨和不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咬緊牙根接受這個提案，同時却企圖使它中立化和把它埋葬。另一方面，蘇聯的提案在世界各國人民大眾中引起了最廣泛和熱烈的

反響。全地球的「平常的人們」都看到，只有蘇聯才能提出對戰爭的危機作鬥爭的現實的綱領。

如果不祛除侵略的根源，就不可能在地球上建立永久的和平。所以很容易明白，關懷創造使德國侵略者不可能復活的條件，是蘇聯史大林對外政策的不可磨滅的光榮。

史大林的明白的言詞中規定了為和平利益解決德國問題的方法：『簡括地說，蘇聯對德國問題的政策，就在於使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和實行民主化，』史大林答覆『星期泰晤士報』記者威斯說，『我想，使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和實行民主化，便是確立一種鞏固而持久的和平的最重要保障之一。』

蘇聯對德國問題表現了史大林對外政策所特有的澈底性。對於蘇聯和美英兩國在克里米亞和柏林會議所共同通過而後來法國也參加了的決議，她也不退讓一步。

這種意圖貫徹了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莫斯科外長會議席上的演說，也貫徹了德國蘇軍佔領區蘇聯所實行的政策。關於賠償的支持，關於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關於她的解除納粹主義和解除軍國主義化，關於它的軍事潛力和魯爾的管制，關於所有這些問題方面，蘇聯指出：堅持柏林會議所決定的立場，

不讓英美帝國主義者祕密恢復德國侵略的根源，把西部德國變成自己野心計劃的基地。

如果從西方轉向東方問題，蘇聯的對外政策在這裏也是按照他和盟國共同通過的決定為基礎的，雖然美國對這些決定實行着怠工。

蘇聯主張在朝鮮實行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決議，努力在全國造成民主化的條件。蘇聯反對印度尼西亞的戰爭，以求印尼民族的自由。蘇聯主張英軍退出尼羅河流域，以求埃及民族的獨立。

最後，蘇聯企求日本的民主化，反對帝國主義使日本在自己庇護故態下復萌而充任美國在東方的憲兵。

鞏固的和平，只有列強在這個目的下面實行合作的條件之下才有確立的可能。這就是為什麼蘇聯特別成為這種合作的最熱烈的保衛者，不管所有反動派集團如何破壞它而造成了各大強國之間的分裂。

這就是蘇聯對外政策的善良的目的，明顯的任務和坦直的路綫。

所以，很容易明瞭，英美反動派，以及過去那些覬覦世界霸權的失敗者，當然要對蘇維埃國家表示仇恨了。

另一方面，我們這時代的人民大眾，普通的人民

，他們要求鞏固的和平，要求在民主和民族獨立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生活，不願意爲金元大老闆奴役，這些普通人民都贊成和感謝蘇聯及其對外政策。

當然，英美反動派非常希望回復到把蘇維埃國家從國際舞台上隔絕起來的舊時代。在那個世界中，他們互相締結損害弱小國家和其他民族的協定是比較多了。二十年前，在一九二七年，史大林說：蘇聯的和平政策，是防止新戰爭煽動者的沉重的阻礙物。

現在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活動是無比的困難了。『現在決定國際關係上的重要問題，不能沒有蘇聯參加或是不傾聽她的聲音了。史大林同志的參加，被認爲是成功地解決複雜的國際問題的最好的保證了。』（莫洛托夫）①②

帝國主義反動派無論提出什麼反蘇的謠言和譏諷，人民大眾總是知道，憑三十年的經驗，『在保衛和平與安全的事業方面，蘇聯是很可靠的。』（莫洛托夫）

過去三十年間的蘇聯對外政策，走向的是遍地荊棘和困難的道路。要精細地記述蘇聯始終一貫的和平外交政策，暴露一切類型和色彩的帝國主義者無數反

①②莫洛托夫在選舉人大會席上演詞，『黨的建設』，一九四七年，第三期，第二十頁。



蘇計劃與方案，是可以編寫成許許多多卷書的。

從一九一九年親王羣島會議所決定的方案，直到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專家』計劃，乃至『泛歐洲計劃』，反蘇『十字軍』計劃，以至於現在隔離和削弱蘇聯的方案，都是由英美反動派一脈相承地幹出來的。

只有列寧的天才，才能够奠定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基礎，指出它的進路。只有史大林的天才，才能够沒有列寧而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裏按照列寧的路綫，在暴風雨裏面開拓蘇聯對外政策的道路，穿過礁石和敵人埋在水底的障岩，不管一切阻礙重重，使我國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歷史性的成功。

史大林分析國際關係的天才，決定了他對於國際關係的傾向、遠景及其發展路綫的洞察力和科學家的預見。史大林教導蘇聯外交把最大的圓潤性去和堅強性及徹底性結合起來，他教導蘇聯外交爲了實現偉大的任務而不知疲倦地鬥爭，不放過任何一分鐘和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以便鞏固和平及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地位。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就指出國際形勢的不穩，要蘇維埃政權注意到如何細心和謹慎，如何忍耐和冷靜，以求明白地確定自己的任務。

這種實素完全表現在史大林的對外府策上面。這種政策從未屈從於造謠挑撥，它適時地揭穿敵人的陰謀和打破他們的詭計。它替蘇維埃國家增加朋友的數量，並且按照列寧的遺訓走自己的路，從未向諂媚和恫嚇屈服。

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第一次大會上，史大林說：『蘇維埃政權所想的，已經不只是關於存在，而且是要發展成重要的力量，使它力能影響國際局勢，力能使國際局勢達到有利於勞動者。』<sup>①②</sup>

蘇維埃國家和全世界各國人民都因為蘇聯成爲這種力量而感激史大林的領導。

依靠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擁護，全體進步人類的熱烈的同情的擁抱，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正在史大林領導下走向新的成功，走向和平、進步與民主的成功。

---

<sup>①②</sup>史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

